

金蔷薇

论丛

Jin qiang wei Luncong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

吴家荣 / 著



9

安徽教育出版社

金
蔷
薇

论
从

吴家荣 / 著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 / 吴家荣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8

(金蔷薇论丛)

ISBN 7-5336-3785-2

I. 中... II. 吴... III. 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8129 号

责任编辑:唐 秀 装帧设计:黄 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0

字 数:240 00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 001—3 000

定 价:19.5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2632

邮 编:230063

出版者言

在蔷薇花盛开的季节，我们推出这套丛书。但行内人或明眼人一看“金蔷薇”三个字，一定知道这是一套关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无关风花雪月。因为苏联作家、文学理论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一书在中国创作界、理论界颇具影响。众所周知，《金蔷薇》是一本用文学形式写成的关于作家和创作的优美的书。与《金蔷薇》不同的是，这是一套学术性著作，而非用文学形式谈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但《金蔷薇》的主旨与我们这套书是一致的。我们不想重述“金蔷薇”的故事，但还是愿意引用《金蔷薇·珍贵的尘土》一篇中所引用的“老文学家”的那两段“札记”：

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致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这些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

文学创作是如此，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理论批评也是从无数文学现象的尘土中聚积智慧的金粉，锻制自己的“金蔷薇”。

不同的是，创作的材料是生活、人生、人性；理论批评的材料是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催生婆，其最终的指向也一样：“是为了预祝土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金蔷薇·珍贵的尘土》）

“金蔷薇论丛”初收五种，它们是：顾祖钊教授的《诗魂的寻觅》；方遒教授的《散文学综论》；吴家荣教授的《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黄书泉教授的《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赵凯副教授的《邓小平文艺思想论纲》。

愿“金蔷薇”的故事激励作家、理论家们打造出自己“金蔷薇”，而“金蔷薇论丛”只是人类精神文明这朵巨大的“金蔷薇”中的一粒金粉而已。

序

严云受

吴家荣教授的一批论文即将结集出版,他以作序之事与我相商。这些论文中,有不少篇在发表时我就曾看过,并且与家荣交流过读后感。现在,我就把这些零星的感想稍作整理,付诸文字,权作为序吧。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共收文 24 篇,是从家荣的近百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基本上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前后时间跨度近 20 年。24 篇文章虽然题旨各异,但大体上可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对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如《论艺术的审美特征》、《论文学的审美净化作用》等。这一类论文以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为探讨对象,评述相关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颇见学术追求的勇气与识见。二是对现当代文学中某些创作思潮、创作派别的研究,如《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新写实主义”略论》等。这一类文章的研究对象虽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但有着鲜明的独特的观照点,这就是从把握纷纭多样的文学现象入手,最后达到理论的归纳与建设;作者虽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花去很多笔墨,但目的则是希望从中升华出富于新意的理论见解。后一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大部分。两类文章既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我认为,在这里显现出来的研究途径上的特征,是值得肯定的。

以文学理论为专业的研究者,其探讨的兴趣、注意力当然主要集中于理论问题。然而,要想使理论研究获得坚实的根基,取得创造性的成果,除了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还应当在文学史的知

识积累方面,努力汲取与寻求。历史上凡是有贡献的文学理论家,都阅读过大量的作品,熟悉丰富的文学现象。可以说,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必然会是对某一段时期的文学史十分熟悉的专家。这种境地当然很难达到,然而,有志于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却不能不用这一要求来鞭策自己,却不能不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家荣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将近二十年,他在辛勤地探讨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努力阅读,积累现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料,以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某些作家、某些创作流派与思潮为研究对象,力求避免理论研究上的蹈空袭虚之弊。而在具体作家与文学思潮的评价中,则没有忽视理论建设的目标,因而不断取得可喜的成果。本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纪实文学”的人文关怀》、《“新写实主义”略论》、《新时期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流变及成因》、《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等篇,既对寻根文学等创作流派从整体上作了观照与深入分析,又包含着不应忽视的理论见解。在《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中,作者以《春之声》、《小鲍庄》、《透明的红萝卜》等为代表的新时期的活跃、多样、颖异的小说创作潮流为讨论对象,从创作主体意识、情节构造与人物刻画、主题表达、结构及叙述角度等方面,概括其基本特征,进而提出这一类小说的创作方法是“现代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对“现代现实主义”这一称谓,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者为了作出这一概括,而对新时期小说的一些基本特点的讨论,显然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提升出来的,是有创造性的,它有助于我们对现实主义多样性与生命力的理解。再如,《“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一文,从中外这两个不同文学派别的生存基础与传统的关系、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基本内容等方面的比较中,指出其异同,从而道出了寻根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寻根文学的认识,而且也对现实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促使我们思考现实主义与不同民

族、不同时期的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总之，在这些文章中，创作潮流评论与理论探求有机地汇融于一体。

本书中有7篇文章是以作家的文学观为研究对象的，几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既有长期以来，人们比较重视的鲁迅、郭沫若、阿英、蒋光慈，也有一度几乎为人们所遗忘的周作人、陈梦家、苏雪林。在现代文学史上，上述几位作家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其文学观也各有特征。在论述他们的文学观时，作者努力坚持客观分析的态度，在热情肯定其文学观的积极方面的同时，恰当地批评其偏颇之处；而且，尽量联系作家的时代，分析其文学观的生成的历史原因。家荣曾参加《阿英全集》的编纂，撰有《阿英传论》。在论述阿英早期的文艺思想时，他同样不讳言其曾经有过“教条主义机械论的偏颇以及幼稚和简单化的倾向”。同对创作流派的研究相比，这7篇文章显然具有更浓重的理论色调。在各位作家的具体文学见解的引述、评论中，作者实际上也就体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展开了理论讨论。作家的文学思想是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与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家荣一直很重视这方面的资料积累与分析，这同样表明，他力求为自己的理论研究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力戒空疏。

吴家荣教授曾写过一本《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书同样将理论建设的追求融汇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中，与这本书的研究途径，可以说是前后相续的。我希望，家荣继续坚持这一研究途径；我相信，这条路虽然走起来费力但却会越来越宽广。

200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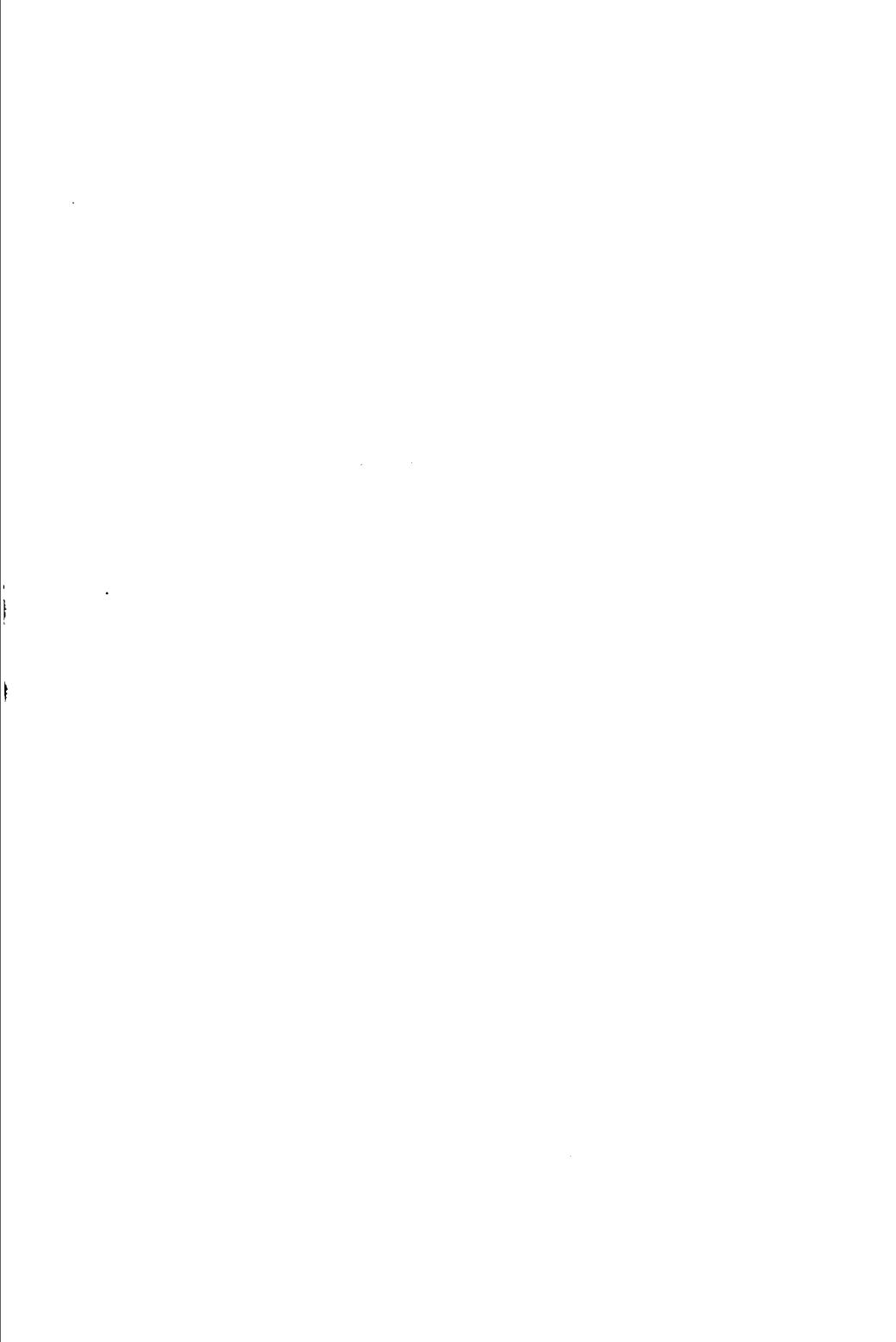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	严云受	1
第一编 左翼文论的锐意探索		1
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学观及其形成	3
二	蒋光慈在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上 的贡献	15
三	阿英早期的文艺思想	25
四	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	43
五	郭沫若诗歌美学思想	56
六	毛泽东文艺观探析	71
第二编 论争与批判的前进足迹		83
一	“左联”与胡秋原的论争及其历史反思	85
二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103
三	陈梦家的诗美追求	113
四	苏雪林文艺思想管窥	126
五	《红楼梦》对《金粉世家》的影响	139
六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	

	154
七	“纪实文学”的人文关怀	167
八	“新写实主义”略论	177
九	新时期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流变及成因.....	186
十	消费主义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	197
 第三编 新世纪文论的建构尝试		217
一	论艺术的审美特征	219
二	作家审美心态特征刍议	230
三	掌握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	240
四	论文学的审美净化作用	250
五	文学批评标准新论	258
六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质疑.....	278
七	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	283
八	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294
九	刘勰文学发展观的现代意义	300
后 记		310

第一编

左翼文论的锐意探索



—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学观及其形成

自 1917 年新文学运动的发轫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主义先驱战士陈独秀、李大钊就以新文学为号召，鼓吹白话反对文言、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为启迪民众智慧，唤起民众觉醒振臂呐喊，在全社会激起了空前反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 1925 年，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张闻天等，则在繁忙的工人运动之余，积极关注文学革命的发展，时时以犀利的笔锋，拨正文学革命的航向，使文学运动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密切配合、相互呼应、同步发展而蔚为壮观；同时也使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逐渐在文艺理论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可以不夸大地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社会承受基础，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导航作用。

(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学观的逻辑起点是文学的社会价值论。或者说，他们从社会革命目的出发，特别强调文学的启蒙教育作用。

中国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之一陈独秀早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的根本改

造在于民众的觉醒，而民众的觉醒必有赖于文学的启蒙。陈独秀积极高张新文学大旗，热忱提倡白话文，正在于这种文体易于普及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易于向劳动人民宣传救国图存的进步思想，从而达到造成国民运动的目的，而当时的文坛，载封建之道的文言文占据正宗地位，鸳鸯蝴蝶派、黑幕派的作品风行一时。文学既脱离了人民群众，也远离了社会生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正是着眼于社会改造的目的，陈独秀才痛斥用文言写就的旧文学“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也正因此，他继胡适的“八不主义”之后，更坚定勇猛地提出了文学的“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如果说胡适的“八不主义”比较偏向于文学形式的改革，对旧文学有着较多的宽容性与妥协性，那么陈独秀的“三大主张”则已跳出了单纯鼓吹文学形式改良的窠臼，初步把文学形式的变革与改造国民性、革新政治的目的连在了一起，认识到文学题材内容的变革创新是文学革命意义更为深远的方面，这就开始把新文学的内容革新提到文学革命首要位置上来，文学形式的革新则是为进步的思想内容的传播服务的。陈独秀是最早从政治角度看待这场文学革命，并力图把它纳入政治革命轨道的人。正如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②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充分体现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新文学看法上的根本分歧，这也是导致二者在《新青年》改组后分道扬镳、彻底决裂的内在原因。早期共产主义先驱战士一开始提倡白话，重视文学形式的革新就着眼于改造国民性的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1月。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1月。

目的,着眼于“革新政治”的要求,而不仅仅囿于纯学术的论争。这一点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有着更明确的体现。如果说陈独秀对新文学的内容还提得笼统、空泛,对政治的具体涵义理解得也还朦胧、模糊,而李大钊对此则有较为深刻、清醒的认识。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鞭辟入里地指出:“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显然,李大钊不仅侧重于从内容上来界定新文学,并对新文学的新内容作了比较明确也是十分大胆的范定,即公开要求新文学必须宣传“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必须服务于政治革新、社会革命的目的。共产主义先驱者的这种激进的社会价值论的文学观,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文学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对文学革命的热切关注,也是基于对文学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邓中夏指出:“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用的工具。诗歌的声调抑扬,辞义生动,更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所以我们不特不反对新诗人,而且还厚望于新诗人呢。”^①文学,由于其形象性、情感性的特点,它对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显然有着其他意识形态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对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欣赏实践中有直感式的切身体会。厚望于新诗人,正在于新诗人能以充满激情的诗唤起民众的觉醒,使人民有革命的自觉、革命的勇气。沈泽民也明确说过同样的话:“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革命的时代中所能成就的

^①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事业”。^①

重视文学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要求文学自觉服从于社会革命的需要,这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也是他们一切文学主张的总归宿。这一基本精神血脉般贯注于他们一系列的文学主张中,或者可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文学主张都只是这种观点的衍化与生发。

首先是对文学阶级性的深刻认识及对文学内容革命倾向性的强调。重视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必然重视文学内容的革命倾向性,文学作品正是靠着具有倾向性的情感内容煽动起人民的革命热情。而对文学倾向性的强调则又导源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透彻理解。事实也正是这样。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中,认定文艺“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因此他指出:我们“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却不可说艺术是创造一切的”。这些精到的论述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观实实在在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点上,他们是自觉地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武器来剖析文艺现象,建构文艺理论大厦的。

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而阶级社会中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定文学的内容应该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强烈的战斗性。沈泽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响亮地提出了“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战斗口号。革命文学的标准诚如恽代英所说,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②这就明确要求新文学必须为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基于这样的认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

① 沈泽民:《文学与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恽代英:《八股》,《文学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以梁启超、梁漱溟、章行严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及对资产阶级右翼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进行了不调和的猛烈的批评，尖锐地指出他们“不啻是叫人们都陷于催眠状态，而使外界的一切罪恶愈益滋长”。^①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才对当时文坛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发出了不满的斥责。邓中夏在《文学与社会改造》中，激愤地呼喊：“莫再做‘阐道翼教’的奴隶文学，莫再做‘风花雪月’的堕落文学，莫再做发牢骚、赞幸运的个人文学，要作社会的文学、要作社会改造的文学。”应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看法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当时民族矛盾、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刻，他们自觉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要求文学家成为无产阶级的喉舌，其意义更是不可低估。然而，相比之下，他们对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对文学社会作用寓教于乐的特点的认识是不足的。特别是把文学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仅仅化约为社会宣传作用，这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学理论上的缺陷。这反映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学观的另一核心问题便是高度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改造，重视作家深入生活、汲取创作源泉的意义。新文学要切实地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作家要能真正创作出儆醒人的觉悟，紧张人们精神的文学作品，作家自身的革命化不能不是重要因素。沈泽民指出：“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②恽代英说得也很清楚：“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的。”^③而革命感情如何

① 肖楚女：《艺术与生活》，《文学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文学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③ 恽代英：《文学与革命》，《文学运动史料》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